



# 游心内运 意境天成

## ——访写意花鸟画家刘玉泉

本报实习记者 孙丛丛

刘玉泉,1955年生。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中国画教授,山东画院特聘画家等。1983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国画专业留校任教,主攻写意花鸟,得于希宁先生指授。1987年经于希宁先生推荐介绍入中央美院研修花鸟画;2008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访学。曾于1989年在山东省美术馆举办“刘玉泉中国书画艺术展”。作品多次参加国家重大展出活动及多种全国性美术作品特邀展、学术展、精品展、提名展等,并被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



《翡翠遮天绿 丹葩映日晴(美人蕉)》94厘米×60厘米



《花开红比朝霞鲜(木棉)》94厘米×60厘米



泰山丹柿 138厘米×68厘米

### 花鸟是余心所爱

“我们这代人是在学院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不仅经过了严格的素描、色彩、速写、人物形象、人体模特等基础课题练习,还广泛学习了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等水墨表现方法与技能。在中国画这个专业领域,在当时教学以人物画为主导的体系下,之所以把学画方向放在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方面,中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刘玉泉自幼受舅舅影响,酷爱绘画,他的童年是看着舅舅画毛主席像、画宣传画度过的,有时也忙里偷闲画几笔,颇得舅舅赏识。刘玉泉出生在一个石油工人家庭,成长于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艰苦创业的年代,从小就跟随父母走南闯北,辗转于甘肃、四川、黑龙江、湖北、山东等地。上世纪70年代,刘玉泉从胜利油田高中毕业,不久也当上了一名石油工人。由于酷爱绘画,他被调到石油会战前线指挥部工会工作,同搞宣传的一个老师傅有许多“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的作品收藏,自己也常画山水、花鸟。受这位师傅的影响,刘玉泉大量接触了中国画花鸟技法。后来,他调回山东,仍坚持学习国画不辍。当获悉山东艺术学院招生时,他便报名选择了中国画专业。四年的学习中,刘玉泉常有人物画作品发表于报端,但在后来的专业发展方向上,他还是认准了花鸟画。“我对花鸟画有一个特殊的情结,自己

打心眼里喜爱花鸟画。”出于对于希宁先生花鸟艺术的仰慕,刘玉泉还直接从于希宁先生处取得画稿直接临习,由生而熟,几近乱真。甚至出现过在将于老的作品范画临完返还时,于老师误将习作当原作留下的情节。“但我后来逐步认识到,艺术是强调个性的。中国画及其花鸟画的发展过程中,大家林立,风格各不相同,都反映了历代花鸟大家不同时代的审美取向与个性操守。”1987年,刘玉泉进入中央美院学习后,便对花鸟画的创作理念进行了一些综合研究,在诸位导师的影响下,逐渐展开了自己对花鸟画的探索之路。

如何摆脱世俗和固定的思维模式,形成有创意的花鸟画创作,一直是刘玉泉思考的命题。“多年来,通过对中国画的技法形态和程式形态的深入梳理,我逐步探索和构建适合自己表现的技法序列,让技巧的丰富性在一个人身上呈现多种技艺的综合表现,这样才能扩大花鸟画的表现力”。然而,将这样的理念放之于实践,刘玉泉坦言,它就像作曲家在一首曲子,演出之前,旋律、节奏、咬字各方面都需反复推敲。“我经常一张画反复打磨,画到最后才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就像电脑时代完成了一个编程,探索的过程是最重要的收获。”刘玉泉说。

### 创作要与自然“交感”

“我曾几次到西双版纳写生,走入热带雨林,感受到的都是铺天盖地的生命气息。那种自然生态环境的博大静谧、植物的盎然生机,能让你抛开一切杂念,沉下心来与自然对话。”每次写生之旅,刘玉泉都在与自然的交互感应中放下思维定势,寻找当时境遇下的独特感悟。

他的作品《雾露霜华》就凝聚着他与自然对话时的冥想。“植物向着太阳,往上生长的生命之‘势’,每每都给我极大震撼。千百年来花鸟画正因展现大自然的生机、生气与生韵而备受关注。”从自然的静谧、动植物本身的品性出发,刘玉泉的创作灵感一次次被激发。它所创作的《雾露霜华》在灰色、朦胧的基调中,将植物与雾、露、霜凝于画面之中,展现出蓬勃盎然的生命韵律。为把美感传递给视觉,刘玉泉还采用了一些“冲破”技法渲染作品的整体意境。因技法的新颖、意境的独特,1999年该作品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中国画的创作,讲求道法自然,物我两忘,在主观性与天地自然的

呼应中,艺术家将埋藏于心底的个人情感宣泄于笔端,或缘物寄情,或以‘比喻’、‘拟人’化的手法寄托其志。”感于自然、宣于内心,在自然生物的物理属性与人的精神追求间寻找对应,是刘玉泉眼中中国画创作所遵循的原则。“梅、兰、竹、菊之所以为‘四君子’,是因为它们具备或耐寒或高洁的独立品质,‘八大’的风格虽然放任恣纵,但也是骨子里率性自然的真实流露。”在刘玉泉看来,“隐于山野”或“餐风饮露”的人生体验都是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认识、一种态度。

中国画讲究“立意象”、“迁想妙得”,而今,这种诗化的意境逐渐被照相机的功能取代了。“写生实际上是面对自然物象的‘目识心记’,在与自然的交流中有所感而发,内心才能渐入佳境。但照相术的发展让许多画家慢慢丢掉了这种习惯。”刘玉泉看来,画家收集素材以取巧的拍照方式代替“写生”,无疑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对于创作来说,‘写生’是不能躲过的一个环节,‘写生’的过程实际上是艺术重塑自然的一个过程。”

### 中国画是文化的载体

“当代中国画的教育是学院的教育,和古代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已产生本质的变化,中国画的学院教育,走过了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但比较前辈们口传身授式的教学模式,学院教育有一定的优越条件。”刘玉泉说。当今学院体系是基于“大文化”下的综合教育,学生所学涉及哲学、美学、文学、史学……因此他们对中西文化历程有较为全面的把握。但他强调:“中国画的发展还应从中国画本体出发。花鸟画在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可以传承的体系,创作要跳出这种传统定势,但也不能因此以西方手段随意改造。艺术家应形成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中国画的民族性非但不能丢失,反而还需强化。”

刘玉泉说,中国画本身是一种以“道法自然”和“无为”的观念,以“静修”和“禅悟”的哲学思想探寻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秩序与轮回的哲学形

态;是一种表现主客观精神与物质和谐统一,表达真、善、美的美学形态;还是一种从绘画角度表现诗意化境界的文学形态。“中国画是文化的载体,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洋绘画。诗、书、画、印四位一体,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当今,年轻人作品中文化内涵的渐失让他深感遗憾。为此,他极力倡导“凡学中国画的当代学子,都要在中国文化精神和程式内涵特征的传承上下足功夫”。

“‘笔墨随时代’,绘画的理法与技法也要与时俱进。在花鸟领域,或尝试借鉴西方绘画的表现手段或一生致力于笔墨探索,不同时代的艺术家都在立足传统精神的基础上,研磨技法,为增进中国画的表现力做出了不懈努力。”刘玉泉强调,热爱绘画就要按内心所想不断探索,不仅要探索笔墨、技法,还要在花鸟画的表现中呈现出民族精神的正能量表达。为此,他还在不断努力。



《清露》193厘米×180厘米



《气荡芳远》138厘米×68厘米



《东风吹琪树(绣球)》94厘米×60厘米

### 作品评论

## 造境的求索

### ——刘玉泉花鸟画读后(节选)

刘曦林

任何艺术都讲意境、讲境界,花鸟画亦然。所以,花鸟画家须有造境的思维和技巧,并因之决定意境之深浅含蓄、境界之高下宽狭,决定艺术的时代精神。玉泉明于此,且探索有得。他在一篇创作心得中说:“我以为在极重意境的中国画领域,只有把功夫下在创造新意象境界上,探索才有出路。”为此,他尤其重视民族传统审美意识的分析与继承,重视生活源泉中的切身感受,寻求新造境的表现形式,使其花鸟画作品呈现出令人可喜的新境界。

玉泉的花鸟画艺术有自己独特的境界,我感受最深的便是生命的谐和。在他的画中几乎每一幅都有各种各样的鸟安详地栖息在花木之间,或低声絮语,或欢歌鸣唱,有时鸟儿就那么静静地候着,仿佛在品味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诗情。那各种各样的植物,或枝,或藤,或花,或果,都是那么有秩序

地叠着,生长着,或浸润着露气,或充满着阳光,好像天造地设的鸟儿们的家园。没有狂风暴雨的摧残,没有凄风苦雨的悲鸣,没有劫掠抢杀的搏斗,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地展示着生命的律动。这与其说是动物们的谐和,动植物之间的谐和,不如说是生命的谐和,玉泉理想中的精神的谐和,这也是他有意追求的花鸟画的新意象和新境界。他特别推崇“天人合一”的哲学,认为“花鸟画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虫一石一水都反映了宇宙生命宇宙精神与人类生命、人类精神的高度融合”。那么,玉泉的花鸟画正是他所意识到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在特别讲求生态平衡的现代社会的折射,是一位现代人的自然观的造境性显现。而这种境界显然是不同于皇家院画的富贵境界和在野文人们的忧愤境界的,而是玉泉所喜爱的、所意识到的现代天人谐和、生命律谐的境界。